



宋代妙文妙诗妙词趣话

学

44

斋

I209.44
L146

I267
2771

· 学子书斋 ·

宋代妙文妙诗妙词趣话

李德身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0014190

(陕)新登字004号

·学子书斋·

宋代妙文妙诗妙词趣话

李德身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2插页 114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20

ISBN 7-5419-2926-3/G·2549

定价：2.30元

目 录

一	“一轮顷刻上天衢”	(1)
二	酝酿革新的北宋前期文学	(3)
	(一) 新古文运动发难者柳开	(3)
	(二) “独开风气”的王禹偁	(6)
	(三) 一片转瞬即逝的乌云	(9)
	(四) “北宋倚声家初祖”晏殊	(12)
	(五) 反“西昆体”文学思潮的初兴	(14)
三	革新大潮中的北宋中期文学	(18)
	(一) 一变宋词词风的柳永	(18)
	(二) 宋诗革新的开拓者“苏、梅”	(21)
	(三) 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帅欧阳修	(24)
	(四) 推波助澜的欧门文人	(28)
	(五) 改革家王安石及其朋友王令	(31)
四	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苏轼	(37)
	(一) “执中持平”的悲剧一生	(37)
	(二)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散文	(40)
	(三) “才思横溢，触处生春”的诗	(43)
	(四) “新天下耳目”的词	(46)
五	革新分流的北宋后期文学	(51)
	(一) 黄庭坚“点铁成金”	(51)

(二) “闭门觅句”和“肆口而成”	(54)
(三) “情韵兼胜”和“盛丽悲壮”	(57)
(四) 周邦彦“穷极工巧”	(61)
六 响彻爱国悲愤之音的南宋前期文学	(64)
(一) 词坛织女星李清照	(64)
(二) 雄伟悲壮的爱国主义呐喊	(67)
(三) 忧国忧民的范成大	(71)
(四) “不听陈言只听天”的杨万里	(73)
七 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	(77)
(一) 可歌可泣的一生	(77)
(二) 充满爱国豪情的诗篇	(80)
(三) 多方面的艺术才华	(84)
八 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	(88)
(一) 战斗不息的一生	(88)
(二) 慷慨悲壮的爱国词作	(92)
(三) 丰富多采的艺术风格	(95)
九 弥漫末世悲凉之音的南宋后期文学	(99)
(一) 慨叹飘零的格律词人	(99)
(二) 充满“衰气”的四灵诗和江湖派	(102)
(三) 爱国诗人文天祥和南宋遗民诗	(106)
十 “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112)
(一) 小说家话本	(112)
(二) 讲史家话本	(117)
十一 异军突起的北国文学	(120)
(一) 金国的杰出诗人元好问	(120)

(二)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124)
十二 “万紫千红总是春”	(129)
后记	(130)

一 “一轮顷刻上天衢”

历史的车轮一刻也不停地向前滚动。晚唐农民大起义的猛烈冲击和各地军事野心家的割据称雄，使得中国大地上象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着封建政权。到了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殿前都点检（中央卫军最高指挥官）赵匡胤奉命带兵防御北方的强敌辽国，把部队开到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他的弟弟赵光义与心腹谋士赵普则暗中进行策划。到了陈桥驿的第二天，赵匡胤喝得大醉，躺在床上，他手下的一批亲信将领突然全副武装来到他的住处，说：“诸将无主，愿策立太尉为天子！”他一跳而起，就被披上黄袍；众将罗列跪拜，高呼“万岁”。这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而这位“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就成了代替后周称帝、结束分裂局面的宋太祖。他建国号叫“宋”，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赵匡胤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这很可以显示出他翦除异己，君临天下的雄心。为了防止农民的反抗和割据势力的复辟，他采取了一整套巩固这个王朝统治的新措施。他的第一招，就是根据赵普的建议，在酒席宴上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要他们解甲归田，多置田产，去当“富家翁”；接着，他任用文官去作将帅，而且不断地调动他们，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达到由皇帝直接控制全国武装力量的目的。他怕朝中大臣专权、地方尾大不掉，就采取分

散他们的权力,使他们互相牵制的办法,而由皇帝总揽大权。为了确保消除“内患”,他一面规定地方只能保留行政经费,其余税收款项,一律收归中央;一面实行“养兵”政策,把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将近六分之五的收入用作军费。他还采取减免苛捐杂税、奖励农民耕织等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以增加国家的财源。他鼓励办学,广开科举之路,从地方到中央按期考核和录取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把他们充实到各级封建政权中去,以换取地主阶级对这个专制的中央王朝的支持。同时,他鼓励封建文人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利用和改造传统的儒家学说,使之成为桎梏人民思想、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

他这套中央集权的统治办法,可谓费尽心机。从实践效果看,的确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崛起,确立了赵宋王朝对于辽和西夏而外的中华大地的统治,使此后一百多年的国内社会秩序大致保持稳定,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高度繁荣和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也正是由于这套中央集权制度,导致宋代军队简直不能打仗,官僚机构则叠床架屋;上层统治阶级财富越来越多,可以穷奢极欲,而下层人民却承受越来越重的养兵、养官的费用,难以逃脱啼饥号寒的厄运;特别是对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一直无力收复,对辽和西夏的不断侵扰一筹莫展,几乎每战必败,败则屈辱求和,乃至撤防赔款,卧榻之下只好听任辽和西夏酣睡而莫可奈何。宋王朝“积贫积弱”这个病根,看来在它出世之时就已深深种下了。

赵匡胤之后的宋朝历代皇帝,一般总是遵循着对内因袭旧制、对外委曲求全的方针,这就使得宋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面貌呈现出与唐朝大不相同的特色,从而决定了宋代文学的发展不能不走自己的路。它在继承固有文学传统时,就不能不更鲜明地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时代风貌。这正象宋人认为有象征意义的赵匡胤《咏初日》诗所说:“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政治上如此,文学上也是如此。

那么,就让我们到宋代各个时期的文坛上看看吧。

二 酝酿革新的北宋前期文学

(一)新古文运动发难者柳开

宋朝建国之初,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了,经济也逐步走向繁荣。为了适应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需要,同时也与宋初大官僚地主奢侈逸乐的生活相合拍,晚唐五代的轻靡文风又被宋初御用文人们继承下来了。但是,随着新王朝统治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逐渐激化,一些出身社会中下层、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开始反对这种流行的文风,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第一个站出来发难,大声疾呼写作韩愈、柳宗元那样的散文,为后来欧阳修倡导的新古文运动开道的,就是柳开。

柳开(947——1000),是河北大名人。他在十七岁时,从一位姓赵的老儒生那儿看到了韩愈的将近百篇的散文,一看就不能放手,从早到晚如醉如痴地读,认为这才是写文章的典范。为了表明自己就是韩、柳古文传统的继承者,他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自名“肩愈”,字“绍元”;后来他还不满意,再次改名叫“开”,字“仲涂”。他解释说:“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途)矣,使古今由于吾也……吾欲达于孔子者也。”看来,他把韩、柳作为宗师,以开孔子道统之途为己任,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只是他的话说得还别别扭

扭，象学生初学写作一样，有时甚至词句生涩得难以达意。他在宋太祖开宝年间中了进士之后，写古文越加起劲。遗憾的是，当时很多人不买他的账，很少有人响应他，这当然使他很丧气。他在晚年写的《再与韩泊书》中，怀着一肚皮牢骚，说他学写跟当今不同的韩、柳式散文三十多年，满指望立身行道一定会大大超出一般人，而能影响全社会，谁知动不动就招人憎恶讨嫌，还受到排斥打击。他做了多任州郡小官，最后做到管理仓库的“如京使”，心情很不舒畅地死去了。

他的遭遇为什么这么不幸呢？当然主要归咎于那个时代的绮靡文风习久势众，积重难返；而他本人则单枪匹马，写作古文的技巧又不纯熟，所以只能呐喊几声，猛冲一阵，还是败下阵来。

尽管他象一个奔驰于沙漠的猛士，并不能改变那广漠的空寂，但是作为一位先驱者，他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

他的功绩主要表现在理论的建树上。他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他在这儿给他提倡的“古文”下了一个定义，一方面对韩愈弟子皇甫湜所倡导的生僻艰涩的文风表示异议，一方面又对韩愈另一个弟子李翱只重意理而轻视言辞的偏颇表示不满。他说的“古其理”，是使文章的内容合乎孔孟所说的“道德仁义”等封建伦理；所谓“高其意”，指立意要高出“今人之文”；所谓“随言短长”，就是要达到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程度；所谓“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则要求古文家向前辈先贤学习，古文要为当时的社会现实服务。基于这些看法，他得出了道与文合一的结论，认为“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他又认为道是目的，文则是手段，道是主要的而文是次要的。他把道比喻作海，而把文比作游海的工具；工具也必须与道相适应，如果用“今人之文”去“明道”，那就跟游海而乘骏马没有什么不同了。所以他特别强调“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乎辞也”。这些见解，应该说是比较高明的，对于道与文、理与辞关系的处理也是比较恰当的，从而给晚唐五代以来再度泛滥的浮艳文风以一定程度的打击，并有助于新的健康文风

的树立。

他写的《代王昭君谢汉帝疏》，可以看作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创作的一篇比较优秀的散文。文中模拟着王昭君被远嫁匈奴君主时向汉元帝谢恩的口气，借题发挥，对屈辱求和、媚外亲敌的卑怯行为进行抨击，表达了作者对于北宋初年就已开始的对辽国采取卑躬屈膝政策的不满。他把“相”、“将”与王昭君加以对比：安定国家，保卫国防，本来是“大臣之事”，可是如今竟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弱女子身上，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他这类议论性文字，虽没有韩愈散文的磅礴气势，也没有柳宗元散文的透辟说理，甚至语言都显得生涩，但是内容充实，文风朴实，真切地反映了现实。所以范仲淹说：“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这是合乎实际的评价。后来欧阳修领导的“新古文运动”，正是发轫于柳开对“古文”的大力提倡，有如南宋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转述张景的话：“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恰当地指出了柳开对宋代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不过，柳开的文论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例如，他认为“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没有看到时代的发展为文学提供了新的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所提倡的道，仍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中的孔、孟之道，而且他把“道德仁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全盘接受下来，却没有新的发挥。他的创作又不能真正实践自己的理论，有重“道”轻“文”的倾向，表现出李翱一派的影响；他的文风实际上继承皇甫湜一派的传统，无可避免地犯有“辞涩言苦”的毛病，不能做到“随言短长”，得心应手。他所写的文章，多是表、疏、论、序之类，很少有生动活泼、平易流畅的文学作品。正因如此，他在与人多势众、沿袭成风的“今人之文”作战时，当然要吃败仗了。

我们面对着柳开现存的《河东先生集》，总好象在听着一位正襟危坐的老儒生在那儿板着脸教训人，尽管句句都合儒家之道，文风朴实无华，但是言辞艰涩，形式呆板，有理也说不生动、说不透彻。所以，他只能成为宋初“新古文运动”的发难者，而无力挑起发动一场革新运动的历史重担。

(二)“独开风气”的王禹偁

柳开虽然怀着极大的热情提倡韩、柳式古文，可惜他眼高手低，理论与实践脱节，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这正象清人纪昀所说：“开之学及身而止。”和柳开大致同时、反对宋初文坛歪风的诗人，如寇准、林逋、潘阆、魏野等，虽然诗风比较质朴无华，都有少量佳作传世，但是大多师法晚唐贾岛、姚合一派，势孤力薄，影响很小。真正能用作品给宋初文坛带来新鲜气息、开一代风气的诗文革新先驱者，只有一个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山东巨野县)人。他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清贫家庭里，只凭着自己刻苦的攻读，三十岁时(983)终于考中了进士。他先后做过左司谏、知制造、翰林学士，官位并不小；就因他这个人刚正不阿，敢于对朝政一再提出批评意见，而落得个“八年三黜”的结果。他消极妥协了没有呢？一点也不。他说“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明确表达了他对宋王朝愤懑不平的心情。正因多次降职，做过多任州县官，他对人民的生活疾苦有了较多的了解，使他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最后他死在被贬谪的黄州齐安(湖北黄冈县)，因此世人亲切地称他为“王黄州”。

他对晚唐五代期间文尚骈偶、诗重藻绘的“艳冶”作风非常不满。他写散文，也以“韩柳文章”作为榜样，主张文道合一，但在创作实践上却与柳开不同。他认为古文既要“传道明心”，就应该好念好懂，平易近人。所谓“句易道，义易晓”，而不能是那种“模其语而谓之古”的冒牌货。看来，同样作为宋初新古文运动的前驱者，柳开走的是一条近乎“怪怪奇奇”、“屈居聱牙”的狭窄小路，王禹偁走的却是一条“文从字顺”、平易流畅的阳关大道。这两种文风，本来都出自韩愈的文论，王禹偁选择对了，因为只有这后一种文风，才是韩愈古文最成功的地方。也正是由于努力倡导这种平易流畅的文风，他才真正成了后来欧阳修、曾巩一派古文家的先导。

王禹偁的可贵之处，在于说到做到，贯彻始终。他的一些古文，如

《待漏院记》、《唐河店妪传》、《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录海人书》等，或借待漏院刻画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官僚形象，或借唐河店妪推敌坠井的故事显示边疆人民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或借黄州竹楼中谪居的乐趣表达他屡遭打击的愤懑心情，或借海人之口叙述的世外乐园寄托他所向往的社会图景，鲜明表现了他关怀国事、同情人民、敢于揭露社会黑暗、勇于说出自己见解的思想倾向；而且这些文章写得短小精悍，形象生动，富有文学意味，语言朴实而又流畅，使人感到是给弥漫着浮艳气息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洁净清新的微风，精神为之一振。

不过，王禹偁的古文还没有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多少还受着骈文的影响。这种情况，就是在《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名篇中，表现得也较明显。比起古文来，他的诗成就更高些，影响更大些。

他是宋代最早提出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学习的诗人。他在诗坛充满靡靡之音的境况下，响亮地宣称：“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有一次，他的大儿子发现他写的两首《春居杂兴》诗，与杜甫的诗意“颇有相类”的地方，就问他是不是从杜诗那儿“窃”来的。他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大喜过望，写诗自贺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看来他对李、杜、白的景仰简直达到狂热的地步，不过从他的诗风来看，他学李的少，学杜的多，而主要学的白居易。他说他本是白居易的继承人，倒是大实话。他敢于不顾流俗，坚决表示继承唐代三位伟大诗人的传统，并用自己的创作成果证明他不愧为宋初唯美主义狂澜里的中流砥柱，给后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中坚人物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他学习杜甫、白居易，首先表现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例如他的名诗《感流亡》，写他贬官到商州时看到的一家流亡难民的悲惨遭遇：逃荒在外，流浪一年，妻死异乡，双亲老病，三子号泣，作丈夫的只好扶老携幼，求乞返乡，“惟愁大风雪，僵死山谷间”，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诗人更把自己被贬谪的怨愤与流亡者的痛苦加以对比，认为自己尽管“家贫与亲老”，然而“睹尔聊自宽”，并在自宽的同时，自责自己做官十年，苟且在位，无异是人民的蠹虫。可以看出，他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人民的同情是深切的，对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更表现了深沉、强

烈的内疚。从这样的诗中，我们不正可以找到杜甫、白居易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吗？

在艺术上，他那些反映人民疾苦的“新乐府”式的诗篇，明显受到白居易的影响，被人称为“香山派”；他的律诗，则表现出向杜甫学习的痕迹；而写景抒情的绝句，却又富有民歌的情调。

例如他的另一首名诗《对雪》，写他在“飘飘满天地”的大雪里，“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的境况中的心情：“因思河朔民，输税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羸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夜来何处宿，寂寂荒陂里。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今日何处行，牢落穷沙际……”诗人在“贫居”之中，却把他思维的触角伸向了寥廓的天地。展现在他脑海中的，是苦难深重的下层劳动人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情景。他作为一个正直的封建官吏，深为自己不能富国强兵而痛苦；他不甘心做一个吸取人民血汗的蠹虫，而发出要为民请命的“直士”、“良史”的呼吁。他这一类诗写得还不少，大多以古体长篇的形式出现，不讲究骈偶句式，也不着意于刻画描写，而是以单行散句直写胸中所感，或对时政进行尖锐的批评，或对劳动人民倾注了满腔的同情，或表达了勤俭自奉的生活态度。这与白居易的“新乐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为宋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初步表现了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格特征。

他的律诗虽然是向杜甫学习的，但是语言却平易流畅，开了宋诗以浅近明达著称于文学史的先河。他的绝句小诗，情趣盎然，语言明快，格调轻松活泼，则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例如：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村行》

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乱入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

——《畲田调》

王禹偁就这样以自己的诗文创作实践，开了宋代文尊韩、柳，诗尊杜、白的先河，为后起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宋初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咏梅佳联署名诗坛的山林诗人林逋，在读他的集子时，曾经拍案称誉说：“纵横吾宋是黄州。”清人吴之振认为“元之独开有宋一代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尤为中肯的评价。尽管王禹偁在诗文理论方面没有多大的建树，缺乏一种改变文坛风气的力量，但是，他已不愧是宋初一位品格高尚、才气充溢、成就颇高的作家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杰出先驱者。

(三)一片转瞬即逝的乌云

正好象世上没有笔直的路一样，文学发展有时也会出现曲折，甚至似乎走了回头路，然而这只是呈现螺旋式的逆转现象，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倒退到原来的出发点。就在柳开、王禹偁的晚年，当他们以毕生的精力想借助韩柳古文、杜白诗歌来挽回晚唐五代纤弱俳巧的歪风之际，一个愈加讲究词藻、片面追求形式华丽的文学流派——西昆派兴起了，而且来势猛烈，影响很大，一时之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其实，纵观文学发展史，它仅仅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两种文学势力较量过程中出现的一片转瞬即逝的乌云罢了。

西昆派是以杨亿、钱惟演、刘筠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学流派。杨、钱、刘都是宫廷文人，身居要职，经常应皇帝之命吟诗作赋，或者彼此在文酒集会上互相唱和。他们将自己所在的修书的官署，比成神话中西王母所住的昆仑山，并由杨亿出面，将他们唱和的二百四十七首五、七言近体诗编为《西昆酬唱集》，号称“西昆体”，而这本诗集中的十七名作者也就是“西昆派”的全体成员了。

据杨亿为本诗集写的“序”所说，这些诗写于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当时柳开、王禹偁刚去世不久。“序”中特别推誉钱、刘二人“雕章丽句，脍炙人口”，而杨亿本人以能够“游其墙藩而咨其楷模”为荣幸。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三人是这个流派的头领，而“雕章丽

句”就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共同文风。“序”中还说他们“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磋。”这正道出他们作诗的宗旨，原来是从“遗编”、“前作”那儿找可以模仿的词藻、典故，彼此之间可以象搞文字游戏一样不断地你唱我和，敷衍成篇。他们认为晚唐有些诗人学习白居易，但没学好，流为“粗俗”；于是就想用李商隐的典丽字眼来扭转那种风气。这样，他们不仅反对白居易“惟歌生民苦，愿得天子知”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也抛开了李商隐的反映现实、关心国事的进步方面，单纯从声律、词藻、用典等形式方面着眼，进行拙劣的模仿，从而走上了唯美主义的道路。当然，他们在“互相切磋”中间，就不能不在艺术技巧方面下一番功夫，使得他们的作品“组织华丽，用事精确，对偶森严”，表现出辞藻艳美、精于用典、对仗工稳，音节谐畅的特点。但是，他们由于脱离了社会的现实生活，人民的疾苦、国事的艰难、时政的弊端统统排除在他们视野之外，就使他们那些专重艺术形式的作品，犹如没有生命的纸花，只能作为贵族殿堂的摆设而已。

那么，他们究竟写了些什么呢？由于他们生活豪华而精神空虚，所写的东西不外乎优游安乐的官僚生活和无病呻吟的矫情；或者歌唱什么夜宴、别墅一类的享乐境况，或者吟咏秦皇、汉武一类的前代帝王，或者模仿李商隐的《无题》、《代意》去描写男女爱情，或者欣赏什么柳絮、槿花等等轻薄的事物，矫揉造作地去抒发什么泪、愁之类的感情。成篇累牍充满浓艳得化不开的词藻，使读者眼前恍惚象堆满了金沙，无法卒读。例如钱惟演的《泪》：“鲛盘千点怨吞声，蜡炬风高翠箔轻。夜半商陵闻别鹤，酒阑安石对哀筝。银屏欲去连珠迸，金屋初来玉笋横。马上悲歌寄黄鹄，紫台回首暮云平。”这样的诗，词藻可谓华丽了，对仗也够工巧了，用事堪称精确了，除此以外，读者还能得到一点什么新意呢？没有。这纯粹是把若干没有作者丝毫真情实感的关于泪的典故堆砌到一块，煞费苦心地再巧为打扮一番罢了。

他们最大的本事，是把李商隐的诗句改头换面，重新编组，算作是自己的创造。例如把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变成“曲房蚕懒不成丝”和“蜡炬风高翠箔轻”，全无李商隐诗句的

意境和执着的深情，有的只是格调低下的仿效和支离破碎的拼凑。他们这样公开拿李商隐的诗句和辞藻作为掩饰自己思想贫乏的遮羞布，曾经引起当时艺人的义愤。在舞台上，扮作李商隐的演员的衣服被一片片地撕扯而去，这位演员不断地大声喊道：我身上的衣服都要叫你们扯光了。“优伶”表演的讽刺剧，不禁引起了观众的捧腹大笑。西昆派文人受到这般嘲讽，实在是咎由自取。

西昆派文人不仅写诗崇尚辞采声律，写文也以华艳骈偶为高。他们写了一些咏物的和“敷扬圣德”的大赋，也号称“昆体”，更是与柳开、王禹偁倡导的古文背道而驰，成了宋初新古文运动的逆流。

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内容极端贫乏，缺乏艺术生命的“西昆体”诗文竟然风靡一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从当时社会的风尚和文坛的景况来看，则是必然的现象。我们知道，宋太祖赵匡胤曾在“杯酒释兵权”之时，开导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就已开了士大夫醉心享乐的风气；宋太宗、真宗都网罗文人，附庸风雅，常召集近臣赏花钓鱼，宴饮赋诗，杨亿就曾多次出于宋太宗的特命，应制作诗，以粉饰太平；士大夫之间更以饮酒赋诗互相标榜，甚至科举应试都要写这种华而不实的“时文”才能考中。欧阳修就说过：“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文号为‘时文’，能者以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特别是杨亿等官位高，名声大，又在书本知识与词章修养上已超过许多晚唐五代的作者；如果再考虑到从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积重难返，那么，柳开、王禹偁则势孤力单，他们的呼声终于被西昆派所抑制，实乃形势使然了。

欧阳修《六一诗话》谈到“自西昆体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可以想见，当时西昆派在文学界势力之大，真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使宋初文坛刮起一股比晚唐五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歪风。但是，物极必反，一场以西昆派为批判靶子的诗文革新运动即将风起云涌地兴起，一代与西昆体针锋相对的现实主义诗文也将应运而生，那么，等待它的只能是“不隔一朝，遽尔湮没”的命运。